

# 雾霾频发 人们为何不愿放弃开车

□ 胡印斌

连日来,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持续遭遇严重的雾霾天气,弥漫的大雾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多地PM2.5值濒临“爆表”,北京城区的PM2.5值曾一度逼近1000。因雾霾引发的交通延误、病患增加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再度引发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高度关注。央视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呼吁,雾霾天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喜欢蔚蓝天空和新鲜空气吗?就从自身做起吧。

雾失楼台,车迷津渡。对此,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不能仅仅停留在污染数据的及时披露上,也不能满足于提供一些“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之类的消极建议,而是应该拿出切实具体的制度举措来,通过相关政策的强力干预,真正实现城市空气质量的好转,还公众一片灿烂的天空。一般公众,似乎也不能习惯性地停留在指责层面,而应该以自己的行动为减少雾霾尽一份力。

只是,行动之难,并不像说说那么简单。以开车为例,目前,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汽车尾气污染。实验表明,城市道路上一辆时速20公里的汽车与时速40公里汽车相比,其一氧化碳和碳氢排放总量要高出1倍,如果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不仅污染物排放增加1倍以上,而且油耗也要增加60%到70%。然而,在我国,公众的购车热情却依然是有增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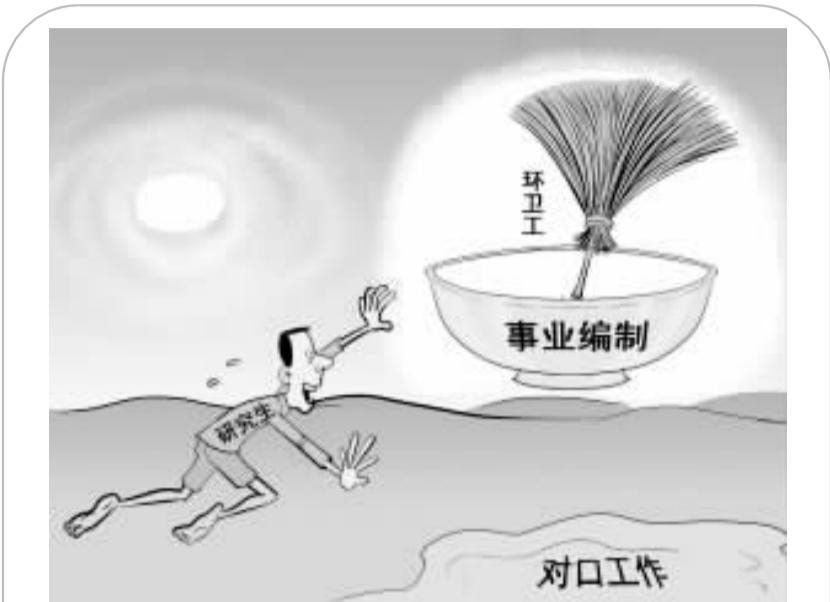
那人们为什么不愿放弃开车?这其中,很多人遇事总想着把责任推给外部因素,鲜有反躬自省、从我做起,固然是一个原因。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整个社会的政策导向、风尚偏

好使然。其一,在国内很多城市,尽管政府年年表态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一些地方在确定重大产业政策的时候,往往没有打算去考虑这些产业的环境影响,比如汽车产业,就曾受到不少地方政府的扶持。

其二,很多城市的规划只是一味贪大,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城市工作与居住之间的连接问题。这种生产与生活的人为割裂,工作场所的高度集中,也就催生了中国大城市无比壮观的上下班高峰现象。事实上,这种城市内的长距离挪移,很难完全依靠目前还不成气候的公共交通完成,至于骑自行车,更是不可即的奢望。因此,开车出行也就成了诸多选项中不得不选的一项。

其三,政府机关自身的行动也具有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比如公车问题,很多人往往从靡费公帑的角度质疑公车的存在价值,其实,公车招摇的最大危害则在于对于社会风气的负向引导。如果政策的制订、执行者都不能以身作则,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又如何去教育、引导、劝诫社会公众翕然景从、放弃开车呢?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毕竟大家都需要呼吸。

空气质量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每一个公民都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问题是,在要求公民履行责任的时候,似乎应该先构建相应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仅仅将污染的球抛给一个个单个民众。在协调自然与人居两个环境上面,政府天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应该采取更为严厉的大气环境质量治理政策,并科学合理规划城市布局,而不能总是说说而已。



## “死在编制里”的社会惰性

□ 文/朱四倍 图/焦海洋

从新闻报道来看,参与者是理性的,最起码是充满了个人理性,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举,环卫工和研究生产生等号关联时,并不是所有研究生都有“学有所用”的追求,更多的则是个体功利算计的产物。

进一步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凸显了制度之悲和社会惰性。并且,就笔者的观点,附着于个体选择上的社会惰性更值得重视。那句流行语——“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折射着“死在编制里”的密码所在。

从本质上说,编制具有计划性,是行政管理资源,编制管理也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正是在这点上,连招聘者也认识到,“新进人员均按照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工勤人员管理,使用事业编制;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均按现行事业单位工勤岗位标准执行”是吸引研究生争当环卫工的要害。

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研究生的指责是多余的,因为是现实倒逼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很多时候,编制是一种保护,而这种“保护”越来越强烈——体制内外的差距越来越大。由此,滋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就是个体惰性汇聚成了集体惰性,进而异化成了社会惰性。多数人热衷稳定而不是冒险和创造,沉迷于享受而不是追求和拼搏。可以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就是证明。正如学者汪玉凯说:搭上体制,成为事业单位的“老人”,反映出体制惰性对年轻人的影响,而这种体制惰性则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惰性。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病症,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显然弊大于利。“死在编制里”的制度之悲和社会惰性需要整个社会来面对。

## 公共辩论,让暴力走开

□ 于德清

据报道,1月13日下午5时左右,作家李承鹏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动时遭遇一名男子掌掴,而在签售临近结束时,又被另一名男子扔刀。

一场作家的签名售书活动,竟然上演了全武行,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动手打人、掷菜刀,都是不对的,涉嫌违法。这无关正义,也谈不上什么崇高,暴力对待异见的背后,只有堕落。

当下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在公共舆论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意见,甚至包括价值观和立场的对立与冲突。这些都是正常的,各方理当宽容对待。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公共舆论空间中的理性表达,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微博约架到韩德强掌掴老人,再到此次李承鹏签售遭暴力闹场,有些人似乎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极端,他们放弃了文明语言,而选择了肢体语言,他们不是去说服对方,而是想用暴力征服对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打了李承鹏的人,竟然曾经是律师。其本来以法律为生,本应很明白意见争讼所应遵循的规则和底线,也应该很清楚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但是,他甘愿以身试法。这无疑是对公理性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公然挑衅。

一味的谴责这个人,并不解决问题。更

## 莫用鸡蛋“袭击”婚礼

□ 方珍

笔者家住一饭店附近,每逢饭店举办婚宴时,饭店门口总是喜气洋洋的,彩色的气球、大红的喜字、充满创意的婚纱照……让路人也沾了不少喜气,但也看到一种不雅行为——用鸡蛋“偷袭”新郎、新娘,结果,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被砸得落花流水,众人是乐了,可婚礼中的新郎、新娘却尴尬不已,从头上到身上流淌着鸡蛋清和鸡蛋黄,别提多狼狈了。看着新郎为躲避袭击而东躲西藏的场景和新娘委屈而无奈的表情,真想说别再用鸡蛋“袭击”婚礼了。有人说婚礼要有人间,不闹不吉利,热闹闹婚礼无可厚非,但用鸡蛋“袭击”婚礼,笔者以为不妥。

一则浪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向来把浪费食物视为一种丑的行为,认为那是对上天的大不敬。鸡蛋乃营养丰富的食品,是供人们食用的,可不知何时,鸡蛋成了婚礼上的恶作剧道具,把一颗颗鸡蛋稀里哗啦砸向婚礼中的新郎、新娘是对食品的极大浪费。

二则不文明。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每位准新郎、新娘都花费了一番心思准备婚礼,

既为自己也为客人留下一个美好的人生记忆。在婚礼中,从不施粉黛的新郎也要打扮一番,新娘对妆容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有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养颜美容,待到举行婚礼的头一天晚上几乎是在美容店度过的,盘头、化妆、穿婚纱……足足花费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只为婚礼那一刻的绽放。可有的新娘刚一下花车,甚至连婚礼都没来得及举办,就被一颗颗鸡蛋砸中,顿时妆容全毁,别说绽放,就是向大家展示一下也不可能了,这该多让人闹心!有的新娘在婚礼上被突如其来而来的鸡蛋砸得面目全非,这种闹法真不文明。

三则污染环境。当喜庆的婚礼被鸡蛋“袭击”后,婚礼现场乱作一团不说,地上一摊黄一摊白的,特别难看,走上去还容易滑倒,既不安全又污染环境,真是不可取。

鉴于用鸡蛋“袭击”婚礼的足多不好之处,笔者认为应文明闹婚礼,比如向新郎、新娘撒喜钱、花生、红枣,让新郎、新娘讲述恋爱史,或者让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既热闹喜庆,又文明体面,还能留下新郎、新娘美丽的瞬间。总之,我们应选择一种文明闹婚礼的方式,别再用鸡蛋“袭击”婚礼。

## 站票就该“站价”

□ 蒋璟璟

近日,有网友呼吁火车票站票实行半价,得到众多网友响应,调查显示近八成网友支持站票半价。有网友称,按照市场价值规律,没座乘客没能享受与车票价钱所匹配的服务,因此无座车票全价不合理。

在站票是否该降价之争中,有的人主张“降价才公平”,有人则宣称“不存在降价的现实条件”。可以说,这是个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价值相当”原则,固然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但无奈,铁路运输业长期供不应求,且“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极低,“站票昂贵”仍遭抢购,便是例证之一。

基于市场正义,火车站票当然该降价乃至半价。只是,铁路运营者很少遭遇“被迫降价”的压力——即使站票卖出坐票的价,乘客既没

有议价能力,也少有替代出行选择。

应该看到,中国铁路运输业绝不是严格意义上自负盈亏的商业主体,而是与公共财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企。服务民众,而非盈利,才是中国铁路的首要使命。特别春运期间,铁路客运更该展露公益性一面。

由此观之,“站票降价”不仅更显迫切,且实现路径也变得明晰:通过专项补贴,或未来制定“低红利上缴率”等手段,主管部门积极主导火车站票的降价过程……当然,我们呼吁公共财政,为铁路让利于民创造更多空间,不意味着主张将其推回到前市场经济状态。在站票降价上,主管部门有责任适当介入,是因为铁路系统极少受到市场力量的约束,而“站票全价”又显然是有悖正义的存在。所以,早点让“站价”跟站票在一起吧!

重要的是,弄明白是什么让他这样做?

从尹某的微博来看,他对韩德强很是推崇。或许,正是韩德强掌掴老人,成了他的摹本。尽管,在微博约架乃至韩德强掌掴老人事件之后,主流舆论对此类行为一致谴责,但是,现在看来,某些人非但没有觉悟,反而在公众的口水之中,有了英雄般的幻觉。在这些极端者的逻辑中,暴力被美化,甚至成为勇敢的代名词,成为博取名利的工具。

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主动民粹化倾向。不管他们给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但暴力伤害社会,拉低了公共辩论的价值,也给他们所拥护的“主义”抹黑。

而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或许正是在于,他们的认知模式与当下社会的实际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时下,民间固然有一些怨言,但是,同样也不喜欢文革做派、流氓作风,文明和法律才是当下最大的社会共识。民众的种种诉求,是要寻求增量,是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倒退,或者他们混乱不堪。

这次事件离流血的不幸擦脸而过,充分表明,当下的公共舆论空间中,火药味有多么浓重,事态究竟有多么凶险,捍卫公共理性,也从来没有如此紧迫。有些人确实应该清醒了。极端主义是一条不归路,在暴力中寻求快感,在堕落中证明存在,并不好玩。玩火者必自焚。